

“垄断”与“反垄断” 谁是毒药？

■ 本报记者 李岷

近日，世界银行在京召开的记者会上出现罕见一幕。一名身着笔挺西装、自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者，面对主席台上的世行行长佐利克，突然高喊：“银行不能私有化，国企不能私有化，华尔街都是骗子，世行报告是毒药。”随后，抗议者在现场散发一份传单——《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这份传单将2月27日世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总结为给中国改革开出了几个药方，即“要求国有银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等”，并对药方逐一进行了批驳。传单最后写道：“世界银行以及佐利克，你们把在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试验失败的毒药拿来中国推销，你们这是成心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

世行这份有关中国改革的报告究竟是什么内容，竟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作为一名学者，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西方常见、中国罕见的过激方式大闹发布会？冲突现象的背后，到底折射出怎样的思想交锋和价值诉求？这一切的确值得人们回味。

热议垄断

2月27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指出，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应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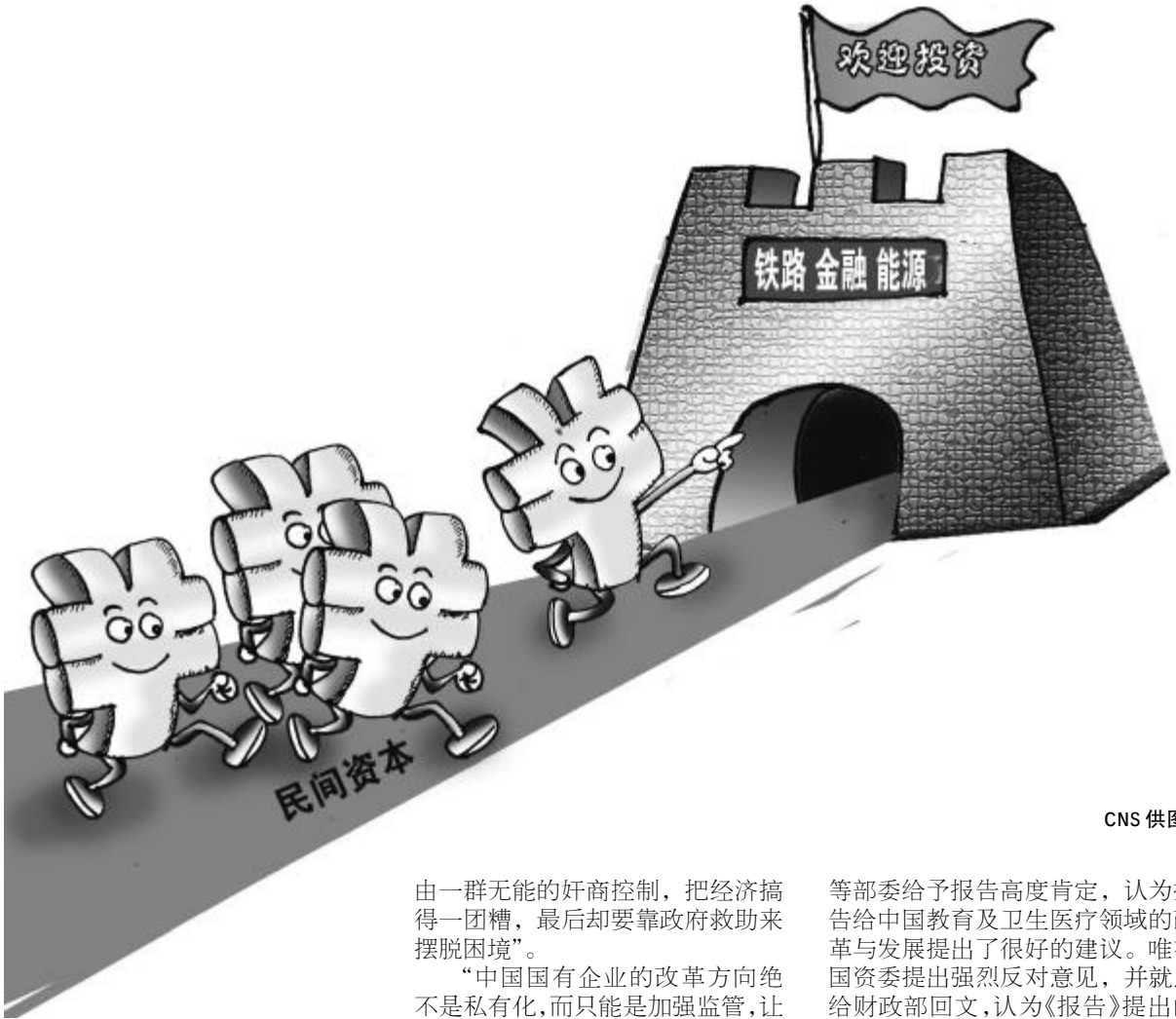
报告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建议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以提振财政预算收入和提高对新的社会性项目的支付。

据悉，参与报告的人士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对国有企业加以监管。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努力保证这些企业依照商业规则经营。国有企业应该将被认为是无关的业务出售，使私营企业更容易在所产生的新领域里竞争。

对世行的建议，杜建国在抗议书中给予了激烈抨击。

他写道：“2009年3月，有人坦言由世界银行参与设计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拉丁美洲私有化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任何经济活动，最重要是要有效率以及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是否私有化。说这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托·德·拉托雷（Augusto de la Torre）。可是今天，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却依旧要把这套陈词滥调当做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



企业国有和私有的争论在中国一直都不曾间断过,眼下,世行的报告和杜建国的抗议书让这种争论变得更加直接和正面。

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后，就会变成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人企业，即使面对核事故也会无所事事；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那样的私人企业，他们

由一群无能的奸商控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后却要靠政府救助来摆脱困境”。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报告开出的第三个药方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这纯粹是在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壁垒’，私有企业也并不敌视国有企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许私有企业进入。像航空领域和高速铁路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平平，那主要是他们缺乏技术积累的缘故。中国的私有企业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对比一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各自缴纳的税收金额，就可以一清二楚。偏袒私企、减免税收，一方面会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危害企业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会像美国那样造成两极分化。世界银行这是在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有人认为，企业国有和私有的争论在中国一直都不曾间断过，眼下，世行的报告和杜建国的抗议书让这种争论变得更加直接和正面。那么报告是如何出炉的，杜建国又是不是坊间传言的“既得利益者”呢？

背景几何

网友爆料，据21世纪网报道，该报告并非世行一家完成，而是由中国财政部牵头，世行与国研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才得以成文。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

程，不是数据的叠加和理论的放大。

譬如对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话题，许多网友表现出这样的担忧：这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国有企业资本流失潮。毕竟国有企业有，那实实在在的固定资产是看得见的；冒进的私有化，会私有给哪些人，会不会就是现有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冒进的私有化会不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引发新一轮的无序竞争，将中国经济拖入诸侯争霸的泥潭，为外来资本并购创造“良机”？

纵观世界历史，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家经济实施休克政策，大力推进国有化，重整了美国经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总统宣布为一些行将倒闭的银行、房地产企业注

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宪违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删改。上述消息未获得国资委的证实，但国研中心一人士从侧面证实了上述消息。他说，这个报告刚刚完成，其中对于国企垄断写了很多，结果国资委给国研中心发了一封很长的函，逐条批驳这个报告，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国资委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

有人表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国务院，是中国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官方智库之一。世界银行帮助中国设计早期市场改革的建议之后，在中国政府机构中拥有较高的声誉。两者合力完成这份报告，无疑增加了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力。

那么杜建国何许人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自己表示，目前就是一个在北京的独立学者，不代表任何机构也不供职于任何机构，这次抗议纯属个人举动。对于“国进民退”的提法，他表示这都是少数学者和媒体炒作出来的。中国的私企老板都很挣钱，现在有人出来骂国企，是因为眼红国企搞得好，想把国企分给了。他认为现在100多家央企中真正政策性垄断企业只有几家，很多国企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例如在高铁、造船、航天科技这些领域，都是因为国企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有科技投入才做大做强了的。私营企业中做得好的，也都是因为在科技上肯投入，比如华为等。

入大量国有资本，并实施国家监管，使这些企业实际具备了国有化的性质。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很快又走上私有化的征程；虽然近期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一面出手救企业，一面为企业还款制定日程，承诺赔还完企业是谁的还是谁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国有——私有”这两种企业制度会在特定时期处于一种动态的转化过程中，任何一方走向绝对就会产生没落。

改革开放以来，“国退民进”、“民进国退”在中国一直循环往复，目前，采取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历史必然，我们真诚期待着学界的回答。但我们希望这种回答是基于一种真诚，而不是哗众取宠。毕竟，被“既得利益者”的滋味并不好受。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垄断之辩

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

国企就像湖人队的科比

针对“国进民退”的提法，李荣融列出一组数据，证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市场比例正在下降：1998年到2010年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数从60.5%下降到19.2%，贡献的税收从65.5%下降到37.2%。基于上述数据，李荣融表示，这些年“民进”的步伐要比“国退”快，从2006年开始，民企占据的资产总额比例已经过半，超过国企，成为市场主力。而同期，针对国企推出的相关政策几乎没有。

针对国企与民企协调发展的关系，李荣融表示将国企比作科比，“湖人队能没有科比吗？光靠科比之外的其他人，能成为湖人队吗？”李荣融表示，除国资委外，其他部委特别是财政部，应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所有企业上，不要区分国企或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必须到位，必须“到点子上”，给准了，企业就活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以公益性调整国有资本配置

迟福林表示，当前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迟福林看来，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为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已经形成。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

他认为，应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

王建宙认为，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自从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以后，整个行业的垄断经营就被打破了。多年来，竞争是很激烈的，竞争最大的好处是让消费者降低了资费。他表示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领域。只有竞争才能加快推动整个行业发展，才能降低价格，给消费者带来好处。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安徽省委主委刘光复：

把不合理的收费降下来

刘光复认为，打破垄断，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努力，必须是自上而下推动，要通过立法。他建议，在立法之外，还需要对垄断行业放开准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形成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长效机制，而且还要在政策上对这些民企有所倾斜。他表示，如果这些都能实现，相信很多不合理的收费会被降下来甚至免除。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长王填：

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

王填算了一笔账：“新四万亿”计划一旦得到实施，根据3—5倍的带动效应计算，4万亿元消费券将直接带动10万亿—20万亿的GDP总量。而且，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可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让想消费的人快速将消费愿望转化为购买行为，立竿见影地拉动内需。消费券的发放，把政府“还利于民”的政策直接用于消费环节，缩短了传导步骤和传导周期，是快速培育社会消费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政府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成果、改善民生的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东进：

国企领导工资不能代表职工

王东进说，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其工资由国家确定，工资构成和集体经济也不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全民的，它肯定是主人，工资就由国家确定，不用谈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王东进说，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益较以前增长了十几倍，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却很慢，到底谁来代表职工的利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职工的工资差距太大，以前是6.5倍，现在已快扩大到17倍。职工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比例太低，甚至低过了我国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王东进认为，国有企业中也要依靠职代会、工会来代表职工，协商确定工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有利于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冯世良：

春运高速公路应该免费

据冯世良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多个省份尝试春节期间收费公路限时免费。“这些免费政策固然值得鼓励，可是由于免费仅限于过节的两三天，此时早已过了返乡高峰，也不是返程高峰，而且这一时段车流也非常少，这样的公路免费实际上对缓解春运压力没有太大效果。”

冯世良表示：“如果春运期间，从节前返乡高峰到节后返程高峰时段，全国公路全部实现免费运营，将大大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减负效果明显。春运期间少收一些过路费，解决国人的春运焦虑，应当算是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本报记者李岷整理）

采访手记

被“既得利益者”的尴尬

■ 李岷

因为国企改革的话题，记者采访了一位“斗士”级的学者。

谈话从杜建国勇闯世行佐利克行长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当记者刚刚抛出杜建国的名字，这位学者就断言杜建国很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当记者同其观点稍稍相左，他立马指出记者立场不中立，甚至要中断采访。

不知道杜建国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反正本人和“既得利益者”毫不沾边。一波三折的采访中，隐隐约约被扣着“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让记者如坐针毡，也就有许多话不吐不快。

学者口中的“既得利益者”不知涵盖多大范围？如果用他列举的数字：国企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7倍，那么国企系统内的所有员工都是“既得利益者”。和国企沾边的所有人等，百姓都可以白眼加之。但在网上，记者看到不少国企一线职工叫屈：强烈要求缩短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若征暴税就征行政人员的暴税。国企内部尚且如此，我等远离国企是非之地，更谈不上“既得利益者”了。

“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让记者想了很多。我们知道垄断行业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我们也知道国企步入了改革的十字路口，我们更理解这些学者忧国忧民的心态，但被“既得利益者”的尴尬，让我们看到了学界些许的浮躁。学者需要亲民，需要走出形而上的书斋，去倾听倾听不同的声音，去把自己的想法真真切切灌输到民众的心里。毕竟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